

【研究討論】 Research Note

六十年來中國大陸的程朱理學研究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Studies from
Mainland China in the Past Sixty Years

文碧芳
WEN Bifang^{*}

*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宋明理學作為儒釋道三教長期碰撞、融合而重建的哲學，代表了中國傳統哲學最高的理論思維水準，其在中國哲學的研究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然而，對宋明理學的研究，伴隨著六十年來所經歷的風風雨雨卻走過了一條坎坷而又曲折的道路，程朱理學研究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也同樣如此。在這六十年裡中國大陸程朱理學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改革開放之前分兩個階段，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即所謂的十七年為第一階段；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即「文革十年」為第二階段。在第一階段，有關二程的論文有二篇，有關朱熹的論文大致有十四篇。此外，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47-1965年）、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966年）、楊榮國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以及北京大學哲學系編寫的《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等著作中都有專門章節對程朱理學作了論說。以上有關對程朱理學的研究大致都力圖將程朱理學與宋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階級等聯繫起來，以分析和揭示程朱理學發生、發展與存在的時代背景、社會根源和歷史特質，這在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等先生所撰寫的《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冊有關程朱理學部分表現得最為典型。該部分不僅梳理了華嚴「理事」說與程朱理學的內在關聯，而且從思想史與社會史結合的視域分析了程朱理學的產生、發展和思想特徵，可謂馬克思主義理論範式研究程朱理學的典範。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中有關程朱理學部分也可以說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範式來研究程朱理學的重要成果。然而，隨著對哲學史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兩條路線的鬥爭的強調，以及唯物主義 = 辯證法 = 代表進步階級的利益、唯心主義 = 形而上學 = 代表反動階級的利益的公式的推出，程朱理學研究中的教條化與泛政治化顯然也就無可避免，於是，程朱理學便被貼上了客觀唯心主義的政治標籤而遭到批判。

在第二階段，有《程顥程頤及其思想批判》（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4年）一冊與伊川縣工農理論骨幹學習班、中共伊川縣委機關理論小組所編的《程顥程頤言論選批》（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5年）一

冊，有關朱熹的批判論文有五十四篇。「文革十年」極左思潮可謂登峰造極，為了「批林批孔」、「評法批儒」的需要，程朱理學作為法家思想的對立面，被戴上了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反動、保守、代表封建大官僚大地主階級利益等帽子遭到否定、批判和橫掃。因此，對程朱理學的真正學術研究在這十年裡完全中斷。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大陸程朱理學的研究大致也經歷了二個階段：第一階段約為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九〇年。一九八一年在杭州召開的改革開放以來首次宋明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標誌著宋明理學的研究進入復甦期，在此復甦期裡大陸程朱理學的研究也進入了一個迅速發展的新階段。首先，有關程朱理學的文獻資料得到了整理和出版。一九八一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二程集》，一九八三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同年年中華書局又出版了《朱子語類》，此外，一些與程朱理學相關聯的理學家的著作和資料被收入《理學叢書》而相繼面世。其次，對二程與朱熹的個案研究取得了一批專門的研究成果，而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史中關於程朱理學的研究也更加深入。

在研究二程與朱熹的專著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潘富恩、徐餘慶的《程顥程頤理學思想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年），劉象彬的《二程理學基本範疇研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87年），盧連章的《二程學譜》（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張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楊天石的《朱熹及其哲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范壽康的《朱子及其哲學》（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高令印、陳其芳的《福建朱子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陳來的《朱熹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鄧艾民的《朱熹王守仁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等。《程顥程頤理學思想研究》一書儘管仍使用唯物、唯心的標籤和一些意識形態話語，但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一部較為系統地研究二程思想的專著，不僅對二程的生平事蹟、二程與當時各學派之間的關係作了介紹和考察，而且對二程的理學思想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和說明，是二程理學研究中一部鑒往開來之作。張立文的《朱熹思想研

究》則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本比較全面、系統地研究朱熹政治、經濟、哲學、歷史、倫理、鬼神等思想的專著，在這部積作者近二十年之功並達五十多萬字的著作裡，一方面作者宣稱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研究朱熹的思想資料，另一方面作者又已初步具備了擺脫教條主義框框的自覺意識，力圖通過邏輯結構的方法來分析朱熹思想中的概念、範疇之間的邏輯關聯以及其思想脈絡，這反映了撥亂反正的復甦期作者在研究朱熹思想時面臨的衝突與艱難。陳來的《朱熹哲學研究》一書則被海內學者推許為那一時期中國大陸宋明理學研究的典範之作，這主要由於該著在朱子學的研究中不僅盡力排除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干預，而且對朱子大量的原始材料作了全面的精詳的梳理、考證和解讀，正是在此事實和文獻的基礎上，陳來對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脈絡、不同時期的特點和核心命題等作了非常詳盡的考辨和深刻的剖析。陳來《朱熹哲學研究》中的這種文獻考證與義理辨析相結合的方法將程朱理學的研究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陳來在研究朱熹哲學過程中有一副產品即《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一書，此書將朱熹兩千多封書信一一加以考辨，按年編次，並辨前人研究之誤，陳來的這種治學方法不僅為新時期的程朱理學研究樹立了一個典範，而且預示了程朱理學研究的新方向。

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斷代哲學史等著作中研究程朱理學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卷五（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的《宋明理學史》上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蒙培元的《理學的演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理學範疇系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張立文的《宋明理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徐遠和的《洛學源流》（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等。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卷五，其中有幾章涉及程朱理學，他在運用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的同時還融入了傳統的文獻解讀方法和西方新實在論觀點，提出了不少他自己獨特的見解，但他在運用這些理論與方法來詮釋程朱理學時又顯然難以達致一種圓融之境。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的《宋明理學史》上卷中有多章涉及程朱理學，這部迄今為止最為全面與詳瞻的宋明理學史研究專著，以豐富的程朱理學文獻材料為基礎，對二程的理學創建之功和

朱子的集大成作了詳細的論述，其所提供的詳實文獻材料對程朱理學研究者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蒙培元的《理學的演變》和《理學範疇系統》、張立文的《宋明理學研究》、徐遠和的《洛學源流》中有關對程朱理學的概念、範疇、邏輯結構、思想脈絡的分析與探討，表現出作者力圖掙脫政治化與教條主義的束縛來對程朱理學的研究進行新的探索，故體現了那一時期程朱理學研究的特點與水準。

第二階段約為一九九〇年至二〇〇九年。這一時期是擺脫了教條化與泛政治化影響的程朱理學研究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時期，在一時期對程朱理學不僅在研究上更加精細與深入，而且還表現出研究方法的多樣化以及擴展對其各個不同層面、領域與後學的研究。一方面，有關程朱理學的文獻資料特別是朱熹與程朱後學的思想資料得到了進一步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例如，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了由郭齊、尹波點校的《朱熹集》，陳俊民校訂的《朱子文集》於二〇〇〇年由臺北財團法人德富文教基金會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與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聯合出版了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所校勘的《朱子全書》，《朱子全書》搜羅了朱熹的所有著作，這是現今最為完備的朱子著作的彙集，等等。另一方面，正是在這些文獻資料的基礎上這一時期的程朱理學的研究取得了極為豐碩的成果。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龐萬里的《二程哲學體系》（北京：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出版社，1992年），周晉的《道學與佛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郭曉東的《識仁與定性》（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高全喜的《理心之間》（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馮達文的《宋明新儒學略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彭永捷的《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束景南的《朱子大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陳代湘的《現代新儒家與朱子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莫礪鋒的《朱熹文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潘立勇的《朱子理學美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年），湯勤福的《朱熹的史學思想》（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徐剛的《朱熹自然哲學思想論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趙峰的《朱熹的終極關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張立文的《朱熹評傳》（南京：南

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蔡方鹿的《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張加才的《詮釋與建構——陳淳與朱子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張立文的《朱熹與退溪思想比較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洪軍的《朱熹與栗谷哲學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朱傑人主編《邁入21世紀的朱子學——紀念朱熹誕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論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吳震主編《宋代新儒學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學為中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等等。

龐萬里《二程哲學體系》作為系統地研究二程哲學體系的專著，其不僅對二程異同的種種方面作了考察和分析，而且對《程氏遺書》等著作中何者為大程語、何者為小程語作了細緻的考辨，故有助於二程思想的進一步研究。周晉的《道學與佛教》採取哲學史的內在徑路，從概念、義理、思想的傳接變化等方面對二程與佛教特別是禪宗的思想、理論、教法、功夫的複雜關係作了較為細緻的梳理和探討，彌補了在二程與佛教關係方面研究上的不足。郭曉東《識仁與定性》作為對程顥思想的專題研究，以工夫論為基本視角將大程思想中的本體論、心性論與工夫論視之為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進行了分析與解讀，認為大程的「學者須先識仁」工夫論是其思想的最大特色，也是大程與小程朱子之學的差異之所在，本書深化了對大程思想研究。馮達文的《宋明新儒學略論》認為程朱理學是在理本論的基礎上由主知論架構的成德論（大程有所不同），這種成德學立足於社會生活的公共性、規範性上是先秦以來各派儒學為其成德學尋找普遍有效性及其依據的努力的繼續，但排拒人的主體性和主體在德性上獨有的創生性，這種看法可謂是一種頗具創意的獨到見解。彭永捷的《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一書在朱陸之辯的探討中，通過對朱子思想嚴密而系統的邏輯結構的揭示與說明，認為朱熹思想的這種思辨性使得儒家的規範倫理學得到了哲學上的論證，從而上升到了哲學倫理學，彭著的這種見解無疑是以西方哲學的相關理論和觀念為參照與借鑒的結果。束景南的《朱子大傳》從文化學的視角對朱子思想形成的氛圍、背景、內涵、性質作了全面的論述，使朱熹的文化個性、文化心態得以還原，使朱熹的人品、修養、道德、思想的風格和精神得以凸顯。陳代湘的《現代新儒家與

朱子學》對現代新儒家學者的朱子學研究作了較為全面與深入的分析 and 考察，表明現代新儒家學者皆對朱子學有著精深的研究和獨到的看法與見解。莫礪鋒、潘立勇、湯勤福、徐剛、趙峰的專著，從不同的角度以朱子思想的某一方面為重點而展開了深入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表明對朱子思想的研究已從其哲學思想延伸到了宗教、教育、美學、文學、史學等各個不同的領域與層面，這些專門化與精深性的研究使得朱子學成為了一門蔚為大觀的顯學。張加才的著作則將朱子學的研究延伸到了其高足，通過對以恪守師說而著稱的陳淳的《北溪字義》的梳理與分析，揭示和說明了陳淳從朱子門人轉變為朱子學傳人的心路歷程和原因以及其「辨析字義」之旨趣，尤其是對《北溪字義》各種版本的收集、對勘與校注，為朱子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完備的文本。

朱子學於高麗時代末期（約十三世紀後期）傳入朝鮮半島，在朝鮮時代則已取得了絕對的權威地位，朱子所確立的義理之旨、話語系統和思想範式被朝鮮時代的士人奉為圭臬，並且朱子學在經過朝鮮朝儒者的幾百年的吸收、研究、探討與推闡後也日趨成熟、深入和精微，故朱子學已不再是僅屬於中國的思想學說，而形成了一個以中國、韓國為主包括日本等其他地區的廣義朱子學的傳統。從八十年代開始，陳來、張立文、徐遠和、李甦平等中國大陸學者開始對朝鮮與日本的朱子學加以關注和著手研究，自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大量韓國、日本留學生來中國大陸留學而大陸學生與學者到韓國、日本留學和訪問研究，對朝鮮與日本的朱子學的研究可以說呈現出了一種蓬勃發展的勢頭，張立文的《朱熹與退溪思想比較研究》與洪軍的《朱熹與栗谷哲學比較研究》這兩本專著是大陸學者對朱熹與朝鮮時代的儒者進行比較研究的成果。李退溪（名滉，1501-1570）與李栗谷（名珥，1536-1584）是朝鮮性理學的雙璧，退溪被譽為「朝鮮之朱子」，栗谷被譽為「東國大儒」，一直以來他們倆都被視為朝鮮時期性理學家中最為著名最為傑出的代表。《朱熹與退溪思想比較研究》一書認為：退溪李滉作為朝鮮朝朱子學大家，不僅對朱子性理學中的概念、命題有著深入的瞭解、把握，而且在與朝鮮朝其他朱子學學者之間所展開的「四端七情」之辯中提出了「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的觀點，從而對朱子的思想作了創造性的發揮，發展了朱子學。《朱熹與栗谷哲學比較研究》一書

認為：栗谷思想與朱子思想一脈相承，作為「東國大儒」的栗谷則對朱子性理學有著極為深刻而恰當的理解與把握，他所謂的「理氣之妙合」「理通氣局」「氣發理乘一途」等說法是對朱子思想的精到的概括和說明。

眾所周知，程朱理學的研究早已國際化，不僅受到了海內外許多學者的關注，而且形成了一個研究程朱理學的國際性學術社群，因此，程朱理學的研究作為一個國際性學術社群的一項共業，海內外學者之間的交流、對話與互動必不可少。朱傑人主編的《邁入21世紀的朱子學——紀念朱熹誕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論文集》與吳震主編的《宋代新儒學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學為中心》作為國際程朱理學特別是國際朱子學會會議論文的結集，正是海內外學者之間在程朱理學研究上交流、對話與互動的產物和結晶，其不僅有力地促進了對程朱理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化，而且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大陸程朱理學研究的國際化和走向世界。

通觀改革開放這六十年來的中國大陸的程朱理學研究，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由於教條化與泛政治化的背景，大陸的程朱理學研究走過了一條曲折的彎路，不僅其研究成果乏善可陳，而且其所造成的影響所形成的思維定勢在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無法徹底泯除。改革開放這三十年，大陸的程朱理學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大陸的程朱理學的研究者既有著對有關程朱理學原始文獻材料的精細解讀和深度分析，也有著在中西比較的廣闊視域中對西方哲學的理論資源的廣泛吸收，從而使大陸的程朱理學研究建立起了真正符合學術規範的研究範式並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可。當然，這些進步更是同與港臺、海外程朱理學研究者的交流與互動分不開，改革開放之前，港臺、海外的學者乃程朱理學研究的主導力量，特別是陳榮捷、牟宗三、錢穆、劉述先、狄百瑞、楠本正繼及其弟子等的程朱理學研究居於前沿處與主導地位；改革開放後，隨著大陸學界對那種閉門造車、自說自話的狹隘研究方式的摒棄和對港臺、海外這些程朱理學研究大家的重視及其研究成果的逐漸吸收消化，大陸的程朱理學研究步入全盛期並開始進入到國際性的學術共同體中。當然，如何面對港臺、海外的程朱理學研究，如何充分吸收他們長期以來積累的各類研究成果，如何在程朱理學的研究上既立足於國際學術界的整體脈絡又不失我們研究的內在

性和主體性，如何在程朱理學的研究上具備一種世界性的學術眼光並樹立我們的主導地位，仍是今日中國大陸的程朱理學研究必須直面的重要課題，也是我們每個中國大陸程朱理學研究者必須思考的一個問題。

今後中國大陸的程朱理學研究如果要在前六十年基礎上於研究方法、問題意識、學術規範等方面更上一個臺階，毫無疑問，首先必須對國內外現有的程朱理學研究成果有著全面與深入的瞭解和把握，只有在真正充分吸收和消化這些現有成果的基礎上才能使大陸程朱理學研究水準超越以往有所提升；其次，對程朱理學的文獻材料讀熟吃透，對程朱理學自身固有特質、內在脈絡了然如心，對程朱理學的文獻典籍所營造的意義世界、精神世界有所領會和同情理解，這也是提升今後程朱理學研究水準前提和必要條件；再次，當今之世，刻意避免與極力拒斥現代思想特別是西方思想對程朱理學的研究與詮釋的介入，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因此，只有自覺地吸收西方哲學、宗教學、社會學等有關理論資源作為參照、借鑒與詮釋資源，才能拓展我們在程朱理學研究上的新的學術視野、新的問題意識、新的研究方法，從而使大陸的程朱理學研究推陳出新、發前人所未發、確立新研究典範、真正居於學術前沿和領先地位。